

关于《燕行录全集》之辑补与新编*

漆永祥

《燕行录》是朝鲜高丽(918-1392)与李氏王朝(1392-1910)时期国王派往中国的使臣所撰写的使行录。自2001年韩国东国大学林基中教授主编的《燕行录全集》100卷出版后,《燕行录》的研究、辑补与新编,逐渐成为中、韩、日等国学术界的热门议题。近年来,笔者也陆续就“燕行录”概念之界定、《燕行录全集》收录标准与原则、存世“燕行录”的种类与数量、“燕行录”整理中的诸问题以及《全集》的纠谬与补遗等,陆续发表过一些文章,本文试就《燕行录全集》等书的辑补与新编,提出一些看法与建议,希望对目前“燕行录”的整理与研究能有一定的参考作用。

一、“燕行录”界定与现存数量

就目前中、韩、日等国“燕行录”的研究现状来看,关于“燕行录”概念的界定与收录范围,仍存在不同的意见。学术界多认为,凡古代朝鲜半岛因各种原因而到过中国的人所撰闻见录,皆属“燕行录”。而笔者以为,这种界定过于宽泛,笔者曾在《〈燕行录全集〉考误》一文中,就“燕行录”之概念有过论述:

《燕行录》,窃以为就广义而言,凡履迹及中国之朝鲜人所著书,皆可谓之“燕行录”;若就狭义言之,则专以朝鲜国王遣往中国之使臣或随从所著之书,方可谓之“燕行录”。笔者以为,《燕行录全集》所收,当以狭义之“燕行录”为收录原则,即凡非燕行使团中诸人所作者,皆不可谓之“燕行录”。否则,若崔致远《桂苑笔耕集》等书中,凡涉中国之诗文,皆谓之“燕行录”,则泛滥而无涯涘矣。^①

也就是说,“燕行录”就是“出使中国的纪行录”,而不是一般意义上“往来中国的游记”。一部书是否算是“燕行录”,必须具备两个充分必要条件:一

*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2010年度规划项目“《燕行录》500种解题”(项目批准号10YJAZH059)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“从观礼朝圣到行蛮貊之邦——朝鲜燕行使与《燕行录》研究”(项目批准号12JJD770013)研究成果之一。

①漆永祥:《〈燕行录全集〉考误》,韩国高丽大学中国学研究所编:《中国学论丛》第24辑,韩国高丽大学中国学研究所,2008年,第234-235页。

是作者必须是由国王派遣的正式使臣,或是使团中的某个成员,或者是负有某种特殊使命的官员;二是作者必须到过中国(或者到过两国边境的中国境内)。反过来说,不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,只具备其中的某一个,都不能算做是“燕行录”。

在明确界定了“燕行录”概念之后,对于哪类著述是“燕行录”,哪类不是“燕行录”,什么书可以收录,什么书不可以收录,就有一个相对明确的收录原则与标准了。笔者经过仔细鉴别与研究,提出以下区别之法:1.凡到南京、北京、沈阳等地出使者所撰纪行录,皆属“燕行录”;2.燕行使所撰“状启”、“别单”与“闻见事件”等,皆属“燕行录”;3.因国境或会谈等问题至中国之纪行录,也属“燕行录”。相对而言,有些篇籍虽然收入《燕行录全集》,但笔者认为不是“燕行录”。如:1.崔溥《漂海录》一类著述不是“燕行录”;2.与中国使臣唱和之作如《皇华集》、《东槎录》等,不是“燕行录”;3.与燕行有关但未出国境之人所撰者,不是“燕行录”;4.一般为宦、旅行、求佛或因他事到中国之人所撰者,不属“燕行录”;5.因各种原因导致误收者,更不是“燕行录”。

“燕行录”成规模的整理与出版,始于1960年,当时韩国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首次对“燕行录”进行初步搜集整理,影印出版了《燕行录选集》2册30种;2008年,该所又选辑出版了《燕行录选集补遗》,凡3册共20种。1978年,台湾台北珪庭出版有限公司在《中韩关系史料辑要》第二卷第一至四册中,收录了明代的《朝天录》36种;而由林基中教授费尽心力搜集整理出版了《燕行录全集》100卷(东国大学出版部,2001年),此后林教授与日本京都大学夫马进教授又编纂了《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》(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,2001年),收入现存于日本的“燕行录”凡33种。近年来林先生又续辑《燕行录全集续集》50卷(出版社未详),《全集》与《续集》可以说是集大成式的大规模整理,也是迄今为止收集此类著作最为全面丰富的大型丛书。

关于目前存世的“燕行录”数量究竟有多少?林基中教授在《燕行录全集》序言估计有500种左右。而林先生在其《燕行录研究》一书中,将《燕行录全集》与《续集》等整合成按“燕行年代顺”排列的目录,共计549种^①。但裴英姬引用韩国学者崔韶子等的统计称,“目前在韩国整理出568种《燕行录》”^②。此568种,应该包括了《燕行录选集补遗》中若郑斗源《朝天记·地图》、赵瑛《燕行日记》、白景炫《燕行录》、元在明《芝汀燕记》等为《全集》、《续集》所未收录的“燕行录”。

就目前存世或者说已经发现的“燕行录”数量而言,要统计数量实际上是一个既容易又极不容易的难题。因为就《燕行录全集》等所收版本来看,有重

^①林基中:《燕行录研究》,一志社,2006年,第491-506页。

^②裴英姬:《燕行录的研究史回顾(1933-2008)》,《台大历史学报》第43期,2009年6月,第220页注2。

收、误收的各种情况,以及《燕行录全集》与《续集》之外,仍有大量遗漏者,未能收录。如果要勉强统计一个现存“燕行录”的总数,那么《燕行录全集》与《续集》共收约490种,笔者从《韩国文集丛刊》(民族文化推进会,1994年)与《韩国历代文集丛书》(景仁文化社,1997年)以及其他朝鲜时代文献中所辑约165种(与《续集》重者约30种),目前存世的“燕行录”已经发现的约有625种,涉及到作者约440人。林基中教授在和笔者交谈中,称尚有再续编50册“燕行录”的想法,那至少也有100种为他所新辑者(作者约50-60人左右),则约有作者500人725种。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弘华文主编的《燕行录全编》(第一辑)称,《全编》出齐后,将“包括500多位作者,700余部专著,概括公元13-20世纪初总700年的中韩交流史”^①。这一说法,应该是基本符合事实的(但《全编》所收录有部分不是“燕行录”)。

因此,笔者的推测,存世“燕行录”在700-750种之间(约500位作者),如果再加上《同文汇考补编》等所收《使臣别单》374种,则总数在1074-1124种之间,这应该是存世“燕行录”所能达到的数量极限了。

二、“燕行录”整理现状与问题

如前所述,“燕行录”的整理,前后有《燕行录选集》、《燕行录选集补遗》与《燕行录全集》、《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》、《燕行录全集续集》等陆续出版。2009年7月,中国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合作,即将出版《韩国汉文燕行录选编》20册34种;而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,也准备选择部分《燕行录》点校出版;目前出版数量最多的是广西师大出版社,已经出版了由弘华文主编的《燕行录全编》(第一辑),约为12册147种,《全编》将收录500多位作者的700余部著述。由此可见,对于“燕行录”的再次大规模整理与新编,已经由韩国转向中国,形成了“燕行录”整理的另一热潮。

但就《燕行录全集》、《续集》与《燕行录全编》的情况看,在整理中存在着许多的问题,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
1.版本来源不详,研究者无从考查

《燕行录全集》所收书籍,全部不注明出自何种版本、藏于何地。读者想进一步研究与查核,却无所适从。从古籍整理之角度讲,这是《全集》最大的问题之一。但因为书籍全部为影印本,所以有一部分书籍尚可以根据版式等,大概判断其版本来源:一种是辑自“燕行录”作者文集者,如裴三益《朝天录》,出自裴氏《临渊斋先生文集》卷三至卷四;郑昆寿《赴京日记》,出自郑氏《栢谷先生集》卷三等。凡此之类,《全集》虽不注明版本来源,但读者可根据影印书页的行款版式与书题等,推测得知其来源于诸家文集,按图索骥,尚能摸清其

^①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页:<http://www.bbtpress.com/aspbookinfo.asp?bh=5177>。

版本来源。另一种情况则是原书藏诸馆阁或私家,在《全集》多达 500 余种书籍中,有不少为作者手稿本、稿本、钞本等,为世藏孤本,人所罕见,弥足珍贵。这些“燕行录”多为独立成书,作者文集中并不收录,如郑澈《文清公燕行日记》、李廷馨《朝天录》、权恢《石塘公燕行录》、金中清《赴京别章》、许筠《乙丙朝天录》等,然此类书籍,无从考查其版本来源,给研究者带来极大的不便与困惑。

2. 重收、误收与漏收等方面的诸多问题

由于《全集》所收书籍众多,又编纂时日有限,不能一一细考,故《全集》中关于作者姓名、出使年代、原书书名等的考订以及“燕行录”的重收与误收等方面,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。有作者姓名误甲为乙者,有作者姓名原题“未详”而实可考知者,有原具作者姓名而实为“未详”者,有原署书名有误当从其本来书名者,有原书非“燕行录”而误收者,有非燕行诗文而误入者,有原书前已收录而后又重收者,有燕行使出使年代失考者,有全书页码重复、错排、倒置与脱漏者,有其他失误者,等等^①。

3. 非“燕行录”而收录者

笔者在前文已经指出,“燕行录”的概念的界定,不能过于宽泛;而“燕行录”类书籍的收录,也应该严加限制。《燕行录全集》所收崔溥《漂海录》、李邦翼《漂海歌》等不是严格意义上的“使行录”。就目前所见弘华文主编《燕行录全编》第一辑的目录看,所收如释义天《大宋求法录》、释普愚《太古游学录》、释懒翁《大元访师录》等,亦不当属于“燕行录”。

4. 谚文“燕行录”整理与“燕行录”韩译诸问题

今世所存“燕行录”,基本上都是用汉语来记载,但笔者所见谚文本约在 20 种以上(有些既有谚文本,又有汉字本,如《热河日记》等)。由于韩文为注音字母,而其文字发展过程中,也屡有变化,因此在今天阅读这些书籍,如果是日记,大概还能推测出大致意思;如果是诗歌,则因为谚文的一音多字,识读不易,要还原为原诗原字原义,则诚为难事,给研究者带来不少困惑。同时,韩国学术界在近些年来,也将不少汉文本“燕行录”翻译成韩文,并取得了不小成绩。但由于“燕行录”多为钞稿本形式存世,识读为难,而翻译者的古代汉语知识尚有欠缺,因此在翻译中往往错误百出,致使翻译成韩文的“燕行录”可信度与可靠度皆大大降低。笔者以韩国学者韩文译注本《乙丙朝天录》为例,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校勘与研究,共核校出译注本各类文字错讹 118 条 130 字,其他韩语翻译本,也都不同程度存在类似的问题。因此,笔者建议可以采用中韩学者合作翻译的方式,以减少错讹,使译本的质量得到保证,给读者提供可靠可信的文、本。

^①详参拙文《〈燕行录全集〉考误》,第 211-252 页。另参左江:《〈燕行录全集〉考订》,张伟主编:《域外汉籍研究集刊》第 4 辑,中华书局,2008 年,第 37-65 页。

三、《燕行录全集》与《续集》的辑补

笔者客韩期间,曾以《韩国文集丛刊》与《韩国历代文集丛书》为主,广泛阅读朝鲜时代古籍,新辑《全集》所未收或漏收之“燕行录”多达165种,现大致依时代先后之次序,排列如下^①:

金圻《北征录》、李齐贤《奉使诗》、李谷《燕行诗》、郑誦《沈阳杂诗》、李穡《燕行诗》、金九容《朝天诗》、李崇仁《奉使录》、赵浚《朝天录》、成倪《朝天诗》、李詹《观光录》、徐居正《北征集》、李石亨《朝天诗》、李承召《朝天诗》、金守温《朝天诗》、鱼世谦《己卯朝天诗》、鱼世谦《庚子朝天诗》、姜希孟《朝天诗》、尹根寿《月汀漫录》、韩应寅《朝天诗》、崔淑精《朝天诗》、金沂《观光录》、蔡寿《朝天诗》、金世弼《朝天诗》、金克成《朝天诗》、朴而章《朝天诗》、金安国《燕行录》、苏世让《朝天录》、李滢(李滉等)《朝天别章》、宋纯《燕行诗》、崔演《西征录遗诗》、柳景深《朝天诗》、许震童《朝天诗》、金诚一《朝天录》、权擘《朝天诗》、高敬命《朝天诗》、裴三益《朝天录》、裴三益(权好文等)《朝天别章》、俞泓《朝天诗》、柳梦寅《星槎录》、金时让《赴京回还启辞》《燕行诗》、申叔舟《朝天诗》、洪圣民《远游录》、崔岵《癸巳行录》、崔岵《四行文录》、蔡裕后《朝天录》、洪履祥《朝天诗》、申钦《朝天录》、赵珩《翠屏遗稿》、闵仁伯《朝天诗》、李廷龟《戊戌辨诬录》、郑士信《朝天纪行诗》、郑士信(柳根等)《朝天赠行诗》、李好闵《呈文》、郑昆寿《状启呈文》、金玛《答兵部问目》、金止男《朝天诗》、张晚《朝天录》、崔喈《朝京时别单书启》、郑文孚《朝天诗》、李尚毅《以书状官朝天时呈礼部卞诬文》、李尚毅(李德馨等)《奏请朝天时赈行诗》、宋英耆《朝天诗》、睦大钦《朝天诗》、洪命元《朝天录》、吴允谦《海路朝天诗》、李庆全《朝天诗》、黄中允《西征诗》、洪翼汉《航海朝天诗》、吴翱《航海朝天诗》、全湜《乙丑朝天诗》《槎行诗》、全湜(李晔光等)《槎行赠言》、申道悦《朝天录》、申道悦《朝天时闻见事件启》、李忔《朝天录》、洪镐《朝天诗》、洪镐(李植等)《赠行诗》、郑太和《壬寅燕行诗》、赵纬韩《朝天录》、李晚荣《崇祯丙子朝天录》、洪柱元《燕行录》、未详《昭显世子状启》、金宗一(申弘望等)《沈行赈章》、沈悦《使沈诗》、申翊全《燕行诗》、赵全素(金自珍等)《赴沈时亲知诸公赠别诗》、李宥《燕行诗》《松溪集》、李宥《到沙河驿状启》、李景奭《西出录》、曹汉英《雪窖录》、金尚宪《雪窖集》《雪窖后集》《雪窖别集》、金寿恒《燕行诗》、李瑞雨《丙辰燕行录》、俞场《燕行诗》、孙万雄《燕行诗》、曹文秀《西征录》、李夏镇《北征录》、

^①关于这些新辑作者书名的称谓,笔者采用的方法是:如果原作者有书名或卷名,则从其旧;如果原作者无书名或卷名,则将在中国元、清两代出使者所撰称为“燕行诗”或“燕行录”,在明代出使者所撰称为“朝天诗”或“朝天录”。因此与林基中《燕行录全集续编》所收,虽同一种“燕行录”,但称名多有不同。

金海一(金声久等)《燕行赠遗》、申琬《燕行诗》、金锡胄《燕行录》、孙万雄《燕行诗》、赵远期《燕行诗》、韩泰东《燕行诗》、柳尚运《燕行诗》、李世华《燕行诗》、申厚载《燕行诗》、柳命天《燕行诗》、申厚命《燕行诗》、李世白《燕行诗》、崔奎瑞《燕行诗》、宋相琦《星槎录》、徐宗泰《燕行诗》、赵荣福《燕行日记》、赵荣福《燕行别章》、李健命《燕行诗》、权以镇《燕行诗》、李德寿《燕行诗》、尹淳《燕行诗》、沈鎔《燕行录》、赵锡命《燕行诗》、金在鲁《燕行录》、李匡德《燕行诗》、赵显命《使沈诗》、李基敬《饮冰行程历》、李基敬《燕行诗》、洪大容《杭传尺牋》、徐命膺《燕行录》、李在学《书状官时别单》、李在学《副使时别单》、金煜《燕行诗》、李德懋《燕行诗》、李德懋《天涯知己书》、朴齐家《燕行诗》、柳得恭《沈行诗》、柳得恭《燕行诗》、朴趾源《燕行诗》、李崇祐《燕行诗》、洪良浩《燕行纪游》、洪良浩《北塞纪略》、吴载纯《燕行诗》、金载瓚《燕行诗》、赵秀三《燕行诗》、洪奭周《辛卯燕行诗》、洪奭周《北行录》、李时秀《燕行诗》、柳厚祚(赵斗淳等)《燕行赠帖》、柳厚祚《燕行路程记》、柳厚祚《柳万笔谈》、南公辙《燕行诗》、金正喜《燕行诗》、沈象奎《燕行诗》、赵寅永《燕行诗》、李奎铉《科宦随录上》、洪奭周《癸亥燕行诗》、洪奭周《辛卯燕行诗》、郑元容《燕行录》、赵斗淳《燕行诗》、金进洙《燕槎录》、卞钟运《燕行诗》、朴永元《燕槎录》、沈枋《燕行别曲》、沈敦永《燕行录》、姜玮《北游草》《北游续草》《远游草》、姜玮《北游日记》、金允植《燕行诗》《析津于役集》等。

后来得到林基中教授所赠《燕行录全集续集》目录,与笔者 165 种目录核检,凡与《续集》重复者有 28 家,分别是:

李詹《观光录》、韩应寅《朝天诗》、朴而章《朝天诗》、申钦《朝天录》、郑士信《朝天纪行诗》、崔喆《朝天诗》、睦大钦《朝天诗》、吴允谦《海路朝天诗》、申道悦《朝天录》、申道悦《朝天时闻见事件启》、李晚荣《崇祯丙子朝天录》、洪柱元《燕行录》、李夏镇《北征录》、申厚载《燕行诗》、柳命天《燕行诗》、宋相琦《星槎录》、沈鎔《燕行录》、赵显命《使沈诗》、李基敬《饮冰行程历》、洪奭周《癸亥燕行诗》、洪奭周《辛卯燕行诗》、郑元容《燕行录》、赵斗淳《燕行诗》、金进洙《燕槎录》、朴永元《燕槎录》、沈敦永《燕行录》、姜玮《北游续草》、金允植《燕行诗》等。

四、“燕行录”辑补情况概述

就笔者所辑“燕行录”而言,所收与《燕行录全集》与《续集》相较,有如下特点与不同:

1. 有《全集》与《续集》已收,然笔者所辑更为全备者

我们以《昭显沈阳日记》为例。“丙子胡乱”之后,朝鲜战败投降,昭显世子李愷(1612-1645)于翌年二月入沈阳为质,至顺治二年(1645)二月归国。其在沈阳为质期间,清廷为置朝鲜馆,世子所带随行官员侍从甚众,下亦设礼、

户、兵、刑等部,管理馆中事务,同时应对相关朝鲜与清室交往诸事,清廷有关朝鲜事务,亦先通报或徵商于世子,而朝鲜往来使臣,亦皆面谒问安,状启往还不绝,俨然朝鲜之一小朝廷。其侍从臣子所记世子言行,类似国王之实录或起居注,亦逐日皆有所记,即后来各种版本之《沈阳日记》。今《燕行录全集》所收,有《昭显沈阳日记》(见《全集》第24-25册)、《沈阳日记》、《西行录》(以上第27册)、《沈阳日记》、《西行日记》、《沈阳日记》(以上第28册)等数种。其中以《昭显沈阳日记》较为全备,后数种则皆为其中之部分或片断,且非同一版本,盖当时钞本不同所致。

但上述《昭显沈阳日记》等,仍非最为全备与权威的版本。在朝鲜被日本占领期间的昭和十年(1935),当时的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整理的《奎章阁丛书》第一种即为《昭显世子_의沈阳状启》^①,该书亦为逐日记事,起自朝鲜仁祖十五年(清太宗崇德二年,明崇祯十年,1637)二月初九日,时世子等在坡州,准备随清兵入沈,然后记途间艰楚,于四月初二日越鸭绿江,初十日到沈阳入馆,直至仁祖二十一年(1643)十二月十五日,世子自沈阳出发返国为止。其间所记诸事,远较《昭显沈阳日记》为全为详,且最为权威可靠,惜《全集》与《续集》皆失收焉。

2.有《全集》与《续集》已收,然笔者所辑可补阙拾遗者

在笔者所辑诸家“燕行录”中,有一部分是《燕行录全集》或《续集》已经收录,但仍有遗漏,或者是收入日记而遗漏诗文,或者是作者不止一次出使中国,《全集》等遗漏一次或数次“燕行录”,或者是收录日记与诗文,但遗漏了燕行赋章等。如新辑苏世让《朝天录》、裴三益《朝天录》、裴三益(权好文等)《朝天别章》、尹根寿《月汀漫录》、许震童《朝天诗》、金诚一《朝天录》与《朝天纪行》、郑昆寿《状启呈文》、崔岵《癸巳行录》、崔岵《四行文录》、金功《答兵部问目》、李好闵《呈文》、全湜(李晔光等)《槎行赠言》、李廷龟《戊戌辨诬录》、洪翼汉《航海朝天诗》、韩泰东《燕行诗》、洪良浩《燕行纪游》、洪良浩《北塞纪略》、洪大容《杭传尺牍》、朴趾源《燕行诗》、李德懋《燕行诗》、李德懋《天涯知己书》、柳得恭《沈行诗》、柳得恭《燕行诗》、柳厚祚《柳万笔谈》等,都属此类情况。

3.有《全集》与《续集》均未收录而新辑者

笔者所辑绝大部分,仍是《全集》与《续集》从未收录者,有日记、诗文、杂记等,如徐居正《北征集》、金守温《朝天诗》、鱼世谦《己卯朝天诗》、鱼世谦《庚子朝天诗》、姜希孟《朝天诗》、金世弼《朝天诗》、金克成《朝天诗》、金安国《燕行录》、柳梦寅《星槎录》、申叔舟《朝天诗》、洪圣民《远游录》、蔡裕后《朝天录》、洪履祥《朝天诗》、宋英奇《朝天诗》、李庆全《朝天诗》、佚名《昭

^①《昭显世子_의沈阳状启》,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整理:《奎章阁丛书》第一,韩国国学资料院重印本,1987年。

显世子状启》、金宗一(申弘望等)《沈行殿章》、申琬《燕行诗》、金锡胄《燕行录》、孙万雄《燕行诗》、赵远期《燕行诗》、韩泰东《燕行诗》、柳尚运《燕行诗》、李德寿《燕行诗》、尹淳《燕行诗》、金载瓚《燕行诗》、南公辙《燕行诗》、金正喜《燕行诗》、卞钟运《燕行诗》、沈枋《燕行别曲》、姜玮《北游日记》、金允植《析津于役集》等皆是。

笔者所辑,虽然不能算全备,但就《韩国文集丛刊》与《韩国历代文集丛书》两部大书而言,基本上已经搜罗靡遗了,而其他朝鲜时代的古籍,笔者所见有限,再新辑的可能性当然很大,但也不会有很多种了。

五、关于“漂海录”与“皇华集”等的处理方式

笔者多次撰文指出,“燕行录”是高丽、朝鲜使臣“出使中国的纪行录”,有着特殊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与外交等背景与关系,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“旅行中国的游记”,因此如《燕行录全集》中所收崔溥《漂海录》、李邦翼《漂海歌》(谚文本)等,既不是使臣或随行人员,更不负有国王的特殊使命,而是由于不可抗拒的外力,为恶劣天气所致,在惊涛大浪中,九死一生地漂流到了中国。因此,虽然他们也写有日记与别曲,但皆不能算是“燕行录”。

同时,在明清两代出使朝鲜的中国使臣中,也有不少文人达士出使朝鲜,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文。如明代倪谦、张宁、董越、龚用卿、朱之藩、姜曰广等,与朝鲜陪从官员相酬角胜,双方都留下了大量的唱和诗作。此类诗作,往往被编纂成《皇华集》、《东槎录》、《宾接录》等。除了现存之《皇华集》外^①,个人文集集中的此类诗作也非常之多。除《燕行录全集》所收如李廷龟《东槎录》外,未收者如申光汉《企斋集》卷八《东槎录》、卷十一至十二《皇华集》,郑惟吉《林塘遗稿》卷上《东槎录》、卷下《宾接录》,柳根《西垞集》卷四《皇华集》,车天辂《五山集续集》卷三《五七言杂录》,李晔光《芝峰集》卷十四《皇华集次韵》,李昭汉《玄洲集》卷一《东槎录》等皆是。此类诗文不属于“燕行录”,而应该算是相反方向来的中国使臣之“使朝鲜录”的附属部分,因为与中国使臣唱和的朝鲜大臣,并未到中国境内,根本谈不上“燕行”,因此应该自成一系,别具特色,而不当与“燕行录”混杂不别。

收入《燕行录全集》的作品,但作者并未到达中国境内的情况,尚所在多有。如权近《点马行录》^②,为权氏自王城至鸭绿江边,述点马(指核检与清点送往中国的贡马)过程与路途见闻,事毕即返京复命,未曾跨过鸭绿江。他如成海应《研经斋全集》^③卷三十三至三十四《丁未传信录》(记福建漂人事),卷三十五《南明书拟稿义例》(编纂南明历史事),卷三十六《风泉志》(记孝宗在

①《皇华集》全6册,首尔国学资料院,1993年。

②见《燕行录全集》第1册。

③见《韩国文集丛刊》第277-278册。

沈馆时事),卷三十八《松锦记程》等(记明军与清军沈阳战役等事),卷四十《康世爵避兵记》(明遗民康世爵避乱入朝鲜事)、《沈行记程》(崇祯八年李浚为春信使使沈阳事),卷五十《建州录》、《建州纪程》(申忠一入建州事),卷五十二《周汉杂事》,卷五十三《唐制考》,卷六十五至六十九《燕中杂录》等,皆涉中国之事。但都是在参考他人资料的基础上所撰,故不能算“燕行录”,尽管有《燕中杂录》这样的卷帙与内容,亦不当滥入。

另外,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密切,尤其在高丽时期,以崔致远等为代表的文士,不仅到中国学习,而且高中进士,在中朝做官,又与中国士大夫文词往还,各有撰述,如崔致远《桂苑笔耕集》之类,所在多有。同时,又有一批高僧,远道而来,或在中国,或往印度等地取经学习,后来陆续撰有各类游记。如果此类著述也算“燕行录”,或者将与中国相关之著述与诗文也算的话,就会收不胜收,泛滥无涯,所以不宜放得太宽。另如《燕行录全集》中所收安孝镇《华行日记》^①,其时朝鲜已在日本铁骑践踏之下,孝镇之行,既非国王所差,亦非日皇所遣,故非“燕行录”可知。

还有一种特殊情况,就是在元代既在元朝做官,又在高丽朝为宦的高丽官员所撰写的诗文,应该区别对待。他们在出使元朝期间所撰的文字,应该是“燕行录”;而在中原任职期间所撰纪行录,则不当视为“燕行录”,而应做为附录缀后,否则也容易引起混乱,好在此类作品为数不多。

笔者认为,对于“漂海录”、“皇华集”等,在对《燕行录全集》等书进行再编与再整理时,皆不当收入“燕行录”正编中;但因为这些书都与“燕行”有相当的关系,如果一定要收录,则可以作为《燕行录全集》之《附录》收录,俾使泾渭分明,不致溷混相杂,也是最稳妥最有利于研究者利用的处理方式。

总之,近几年来研究“燕行录”的学者日渐增多,成果不断涌现,对《燕行录全集》等书的重新整理、辑佚与编纂,也有多家研究机构与出版社正在编纂与出版中。因为《燕行录全集》与《续集》,多出自林基中教授一人之手,整理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如前所述的许多的问题。但从古籍整理的角度讲,如果对“燕行录”不加明确的界定,对其收录范围不加限制,不充分利用现有韩国、中国、日本与美国等国所藏相关古籍,进行版本鉴别、文字校勘、删重纠谬与新辑新补等的工作,而只是选择其中部分影印,或者只图贪多而滥收多收,那么即使再编与新版之“燕行录”,也只不过是重新编目与增加数量而已,这种重新编辑与新版,无疑只是重复印刷,并不能使“燕行录”的整理在质量上有所提高。相信本文所论,应该对《燕行录全集》与《续编》是很好的补充,也将为更加全备与完善的新编《燕行录全集》之编纂,提供积极与有意义的参考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北京大学中文系、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

①《燕行录全集》第99册。